

◎中国封底丛书

权力的旋流

中国官吏群像馆

程一身 著

特邀顾问指导：孔庆东 朱大可 朱建军 李国文
江晓原 苏三 吴言生

一部从人的角度阐述的官吏史。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中国封底丛书

权力的旋流

中国官吏群像馆

程一身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权力的旋流：中国官吏群像馆 / 程一身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1
(中国封底丛书)
ISBN 978-7-80587-899-7

I. 权… II. 程… III. 权力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644 号

权力的旋流——中国官吏群像馆

作 者 程一身 著

责任编辑 张国强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1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899-7

定 价 19.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回答自己两个问题

即使在书稿完成之后，我觉得仍有必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写官吏？第二个问题是，在官吏尚存的世界如何做人？

早在写作之初，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有个学生曾经问我：“你没有当过官，为什么写官吏呢？”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可以这样回答他：长期以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吏，一种是平民。二者同时并存，是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尽管我没有当过官，实际上却是被官吏统治和管理的对象。因而，作为他们的对立面，我对官吏并不陌生。其次，我知道官吏也是人，喜欢出人头地（未必是坏事），爱好争名夺利（不见得是好事）。这种心理人人都有，只不过在官吏身上表现得更加集中、更加公开罢了。就此而言，我算是个潜在的官吏。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官吏属于我的传统文化研究三部曲之一。^①我试图通过这几本书对比较重要的几种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论梳理和现代阐释。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主要症结在于古今的冲突：研究对象属于古，研究者属于今。今人不可能变成

^①其他两部分别研究身体和父亲问题，都已经完稿。其中，研究身体文化的《中国人的身体观念》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古人，研究者不可能变成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道德的现象，而只有对现象的一个道德的解释。”仿照尼采的这句话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全面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只是对历史的个人解释。”因此，一切历史不仅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既然所有的阐释者都避免不了自身的主观性，历史研究的要义无非是在不违背客观性的基础上做出一种尽可能具有普遍性的解释。陈寅恪研究柳如是并未变成柳如是，而是对她充满了理解和同情。由此来看，历史研究也需要一些想象力，在同情的理解与必要的想象中设身处地想一下，以达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重合。因此，卓越的历史研究中总会有一些心灵的自传性质。

无须隐晦，本书就是一种对历史的个人解释，它意在表述一种既往事实的可能性。当然，仅限于官吏问题。但是，这绝不是一本官吏史著作，与官吏有关的史实充其量只是本书的理论依据。这本书旨在建构一种基本稳定又比较开放的官吏学，不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之类的专业角度出发，而是主要从文学这个相对外在的边缘角度展开论述。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本书没有采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将官吏作为中心直接摧毁；没有采用福柯以边缘解构中心的思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研究官吏；也没有采用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将官吏和平民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总之，我的立场既非官吏，也不是平民，而是貌似游离局外、其实内在于其中的“人”，即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官吏。所以，对于官吏，我既不倾慕，也不鄙视，只是把官吏当作力求客观又不无同情的研究对象。

我之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官吏，把权力与人的关系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重点剖析权力环形结构中的权力场问

题,一方面是由于我把官吏学定位成了“人学”,另一方面是想分析一下做官与做人之间的关系。在官吏尚存的时代里,做官固然有其优越性。但是,事实证明:一个人当了官不只是多了一身官服,为了适应这身官服,往往使人付出扭曲性情、损耗生命的昂贵代价。这自然是一个关系到人性和国民性的大问题。事实上,这已经进入了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在官吏尚存的世界如何做人?”

众所周知,法国思想家福柯以《规训与惩罚》等书建构了其影响深远的话语权力理论。但是,本书很少直接征引他的观点。事实上,福柯探讨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源头都在尼采那里,诸如权力、规训、身体、惩罚、疯癫、性,诸如此类。所以,本书更看重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前言中,尼采认为人“太不完美”,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因而他激情地宣扬超人理论。我再模仿一次尼采:官吏“太不完美”,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因为其具有非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本质。根据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官吏最终是要被消灭的东西。如果说超人理论的精神是一种自强自救,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集体解放。“在官吏尚存的世界如何做人?”简而言之就是:谨防其害,逐步消除。

目 录

第一章 官吏与权力的环形结构 / 001

- 第一节 官吏的诞生 / 003
- 第二节 权力环形结构中的官吏 / 007
- 第三节 官吏：动态刻画 / 017
- 第四节 官吏：静态描述 / 027

第二章 官吏的谱系 / 037

- 第一节 官吏史前史 / 038
- 第二节 官吏的谱系 / 057

第三章 权力场 / 069

- 第一节 作为权力主体的官吏 / 071
- 第二节 权力的实施 / 093

第四章 权力主体的合力剖析 / 107

- 第一节 君臣之间的恩怨 / 109
- 第二节 权力的授予与回收 / 119
- 第三节 私人情仇与党派之争 / 128

第五章 官吏的符号 / 139

第一节 官吏的语言 / 140

第二节 官吏的符号 / 149

第六章 对官吏的精神分析 / 169

第一节 山高我为峰 / 172

第二节 为官者的牢笼 / 182

第三节 伴君如伴虎 / 192

第七章 权力与人性 / 203

第一节 权力与欲望 / 205

第二节 无情最是帝王家 / 213

第三节 权力崇拜与人性奴役 / 224

第八章 权力舞台的遗址 / 237

第一节 作为国土中心的朝廷 / 239

第二节 遍布各地的衙门 / 251

第三节 在不断流动中驻扎的军营 / 260

后记 / 269

主要参考文献 / 271

第一章

官吏与权力的环形结构

官吏与权力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简而言之,官吏就是拥有权力的人,但是并非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是官吏。因此,本章首先对官吏进行了语义学分析,然后主要从官吏产生的角度探讨官吏与权力的关系,在深入解析权力要素的基础上界定官吏的起源问题。作为君与民中介的官吏,事实上是权力环形结构的重心,所谓权力的环形结构其实生成于君、臣、民之间的权力来回往复运动之中,其中的“臣”即官吏。官吏的权力来源于国君,指向于民众;根据权力的不同实施方式,民众会对国君和官吏行使的权力做出相应的反馈:或拥护,或反对,从而反作用于官吏和国君,这就是权力的环形结构。权力的环形结构始终是权力场的主要表现形式,官吏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这个结构中展开的。本章主要从官吏的宦海沉浮与权力实施(动态刻画)以及对官吏的类型评定(静态描述)这两个方面加以简要的梳理。

第一节 官吏的诞生

直立行走之后的人跟动物的不同之处越来越多，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各种动物之间的差别要小于动物和人（所谓两足无毛的高等动物）之间的差别。在水世界中，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在山林里则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凡此种种，正如赫胥黎所概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跟人相比，低等动物之间这些本能无非是小打小闹。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存在于星辰之间，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要远远大于最威猛与最怯弱的动物之间差别的总和。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常常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界线的这边被称之为官吏，而界线的那边则是平民。

在汉语里，“官”是个会意字，其甲骨文字形从“宀”（mián），意为“深屋”、“覆盖”，以“宀”覆众，有治众的意思。起初，“官”本是臣吏之居所，意思是为君主和朝廷办事者的处所，或管理群众的处所。《礼记·曲礼下》中说：“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郑玄对“官”所做的注解是：“官谓板图书文之处。”后来，“官”这个字逐渐引申为对有政府职务人员的称呼。《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官，吏事君也”，揭示的是官与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官是隶属于君，并为君服务的。因此，《易经·系辞下》里有“百官以治”的说法。官对上为君主朝廷办事，对下管理群众，所以他的地位就处于君和民之间。

“吏”也是个会意字，其甲骨文从“手”、从“中”，以“手”持

“中”(即“笔”),其本义为官吏。和官相比,吏的地位一般较低,大多是权力的实际执行者。汉字中的隶书就是这些人为了抄录快捷而把小篆变成隶书的,张怀瓘在《书断》中对此做了如下说明:

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禁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三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隶书把小篆那种不规则的线条变成了有规则的笔画,从而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官吏”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恰好与“管理”谐音,孔颖达在给《礼记·王制》中“王者之制禄”这句话做注疏时说:“其诸侯三公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一个人之所以能管领另一个人是因为他有权力。权力是比官吏出现得更早的东西,所谓官吏不过是权力在某个人身上得以固定地集中体现而已。因此,要想把握官吏的诞生问题,首先应该探讨权力是如何生成的。

作为一种力量,权力和位置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权力是在特定的位置上生成的,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构成了人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有的人如崇山之高,有的人如深谷之低;人的高低取决于他拥有的财富。那些看起来很高的人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许多财富,而那些显得很低的人除了脚下的大地之外一无所有。众所周知,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水的力量来

源于从高到低的流动当中,特别是从高处坠落的瀑布,它那种伴随着轰鸣声的力量就是来源于地势巨大的落差。总之,正是大地的不同形势激发了水的力量。而权力也是在财富不均的人群这种平静的形势中盘旋流动生发出来的力量。像水一样,权力的力量从高处流向低处。在地位相同的人们中间,权力只是一种平面的存在,它只保留着自己的势能而不产生任何力量。一旦地位略有起伏,它就会在流动中冲撞奔涌成一股力量,而且人群之间的财富差别越大,这种力量也就显得越强烈。所以,权力的实质就是在财富不均的人群中形成的一种召唤和服从的呼应关系,其根本在于各自财富的有无和多少。作为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生死的分界线。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意味着死亡的临近,而物质生活资料的富余则会给拥有者带来更多的可能,其中的一种可能就是他可以向那些缺吃少穿的人发号施令,人群之间的权力就是这样诞生的。大量的帮闲以至帮凶往往以食客的身份依附于他人,战国时期的信陵君等四公子都豢养着大量的食客;而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权力是从财富中产生的这个道理。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财富不均是怎么形成的?财富不均出现于产品出现剩余之后的再分配。和有些动物不同,人从一开始就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在狼虫虎豹的威胁下,群居成了生存的必要手段。群居时代的人们以集体的形式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由于人自身禀赋的差异,便决定了他们在劳动分工过程中的不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实是一种绝对的存在。那些在获取生活资料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人自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人类

社会是先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这是因为在农业出现之前，妇女从事的采集活动是人们谋取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形式。如果说不平等最初起源于不同身体素质以及相应分工的话，到了后来便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作为一种生存优势，财富一旦成型就会滋生出新的优势，从而保障了权力的稳定化和因袭化。但是，从长时期的范围来看，财富的拥有以及财富的多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财富发生转移，权力也就会随之而转移。而曾经拥有财富的人只不过成了权力运动的轨迹。所以，在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只是一些有财富、有权力的人，然而他们还不是官吏。确切地说，官吏一方面是财富集中获得稳定之后的产物，因为只有从稳定的财富中才能滋生出稳固的权力；另一方面，官吏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其实是伴随着国家政权而产生的，它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而，官吏是紧密围绕在财富周围的一个群体，他们以自身原有的财富掌控着民间的财富，相对而言，他们自身的财富总是有限的。所以，后来形成的官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从民间搜刮财富和运输财富的人。

由此来看，官吏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在不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生成的一种权力关系。作为一股指向民众的激流，权力使高高在上的官吏处于稳固的优势地位，而民众则成了从已拥有的财富到未拥有的财富甚至包括生命本身在内的东西都一并遭到长期合法剥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变成官吏，而不是成为一个平民，成了芸芸众生的渴望。道理很简单



秦始皇陵官吏俑

单,因为官吏具有一种明显的优势,它意味着生活的余裕、生命的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尽可能。

第二节 权力环形结构中的官吏

所有的官吏都是处于权力序列中的一员。作为一个拥有权力并行使权力的人,官吏的权力受命于君,而指向于民,所以,君主和人民分别成了官吏权力的来源和趋向。权力运行于财富构筑而成的河床之上,源头为君,河流为官,民众为海。其中的官就像一个权力的过渡体,它构成了权力发散的通道。但是就像拍岸之水一样,权力的运行并非完全是单程的,它也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回流,以至于透过层层阻挡,把水花溅到君主的脸上。权力从君主授权与官、指向于民到民反作用于官和君主,就构成了权力的环形结构。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推行的是禅让制,而禹死之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启。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从此开始了父子相承的中国君主世袭制。为了标榜其神圣性,它被称为“天命”,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世袭制的出现和传承表明了人的自私本性,是私情战胜公理的典型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君主的权力是一种祖传之物,它来源于先人的披荆斩棘和勇武智慧。所谓“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诗经·周颂·烈文》)。对于因朝代更替而导致的原有世袭制的中断和更新这种现象,新王朝的建立者动用的辩护词往往也是“天命”,所谓“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二后

受之”。西周时用“天”代替了殷商那种“帝”或“上帝”的“至上神”观念，周王被赋予“天子”的称谓。周代的铜器“毛公鼎”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在汉代获得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天意”、“天志”的概念和“天人相与”的理论。他认为天和人之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该按照天的意志来行动。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①由于天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地去做。

中国的君权神授论者都说自己受命于天，目的在于强调自身权力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这种做法后来对历代帝王以及农民起义领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无论做什么都说是受上天的指使，所谓“奉天承运”、“替天行道”之类。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和杨秀清就是以天父附体、代为传言的形式赢得别人信任的。总而言之，君权本是祖传之物，或是从异姓那里抢夺来甚至偷来的东西，所有的神化都不过是对它的人为装饰，是权力促使其拥有者制造的一种假象。陈桥兵变中的赵匡胤有一个重要



董仲舒

^①“天子”是中国人对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特殊说法，其他民族的称呼主要有“大王”（印度），“统王”（来自伊朗），“主”（来自塞种语 Murunda，意为主人），“富裕的统治者”（罗马），“首长”（来自梵语 Sahi）。参见何兆武、柳卸林编《中国印象》（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7页-368页。

表演就是黄袍加身,现在看来这更像一出闹剧。事实上,所有这些神化、装饰和表演无非都是权力捉弄人的游戏。

从专制时代到民主社会,权力给它的最高拥有者最终带来的往往是不安全感。太平天国内部的自相残杀正是权力的分裂与失衡造成必然结果,杨秀清的居功自傲对洪秀全形成了威胁,韦昌辉的不良用心使洪秀全对任何不姓洪的人都产生了怀疑。所以,为了维持暂时的安全感,他把信任转向了自己的哥哥,而不再是那些有才能的异姓兄弟。权力的明争暗斗使他把才能与反叛联系在了一起,最终还是家族意识浮现出来并且占据了他心头。

如果说君权的来源有些神秘色彩的话,官吏的权力来源就显得清晰多了,即“臣权君赐”。所以,作为一个阶层,官吏其实是接受权力并行使权力的中介。他以臣子的身份行使君权,并把君权最终作用于权力的对象:民众。表面看来,权力的核心在君主那儿,而事实上君权却是由官吏执行的。因此,作为中介的官吏是权力运作的基本力量。简要地说,君主只是个传达旨意的人,而官吏则是最终把旨意以事实的形态呈现出来的人。旨意从传达到执行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时间,作为沾染权力和行使君权的人,官吏往往发挥出他的主体性,从而导致旨意与事实之间出现某些错位、分裂甚至是完全背离的情况。所以,认识官吏首先要把官吏放在君臣关系之中,其次还要把它放在官民关系之中。



洪秀全